

遗忘,是最痛的灾难

□李鸣生

肯定地说,但凡常人,谁都不希望发生灾难,不管是天灾,还说人祸。但从46亿年前太阳星云分娩出地球之日起,地球生物至少经历了五次灭绝性的大灾难;而自人类诞生以来,600万年间数以万计的大小灾难,也如影随形,从未有过中断。比如,1441年开始的黑奴贸易,死亡两亿人;1556年陕西大地震,死亡83万人;1887年黄河大洪水,死亡200万人;1918年西班牙流感,死亡一亿人;1931年长江大洪水,死亡300万人;始于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7000万人;始于1941年的纳粹大屠杀,死亡600万人;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亡200万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亡31万人;2018年汶川大地震,死亡近8万人;而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已造成全球超过450万人死亡、2.2亿人感染。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亦是一部灾难史。灾难带给人类的不仅是无限的伤痛,还有刻骨的眷恋和深深的绝望。人类能提心吊胆、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幸运。但有幸运就有灾难,这是常识,亦是规律。那么,有幸活着的我们,面对无可逃避的灾难,是躲避还是正视?是遗忘还是铭记?

“灾难就像刀子,握住刀柄就可以为我们服务,拿住刀刃就会割破手指。”这是19世纪美国诗人洛威尔为我们留下的金玉良言。“握住刀柄”,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正视灾难。正视灾难,既是人类对自然的清醒认知,也是人类对自身的自觉救赎,就像唯有面对阳光,阴影才会被甩在后面。具体说,即灾难一旦发生,要敢于面对,不回避,不躲闪,及时将灾难的伤亡情况、危害程度、前因后果等真相公之于众。倘若真相总在事发多年后才羞羞答答露出脸面,这样的真相很容易被岁月“风化”,甚至被“整容”,也很容易备受质疑,既不利于幸存者的心理疏导,也无益于汲取教训,更是对生命的践踏和自然的亵渎。

其次,要铭记灾难。为什么要铭记灾难?因为灾难可以让人类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身文明的存续发展保持足够的自信,而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敬畏与自信,才得以延续至今。铭记灾难,不光事关国家民族,也与每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灾难既是刻在人类心灵上的一座墓碑,也是竖在人类面前的一面镜子,唯有铭记,才有反思与自省,进步与动力,时刻提醒人类长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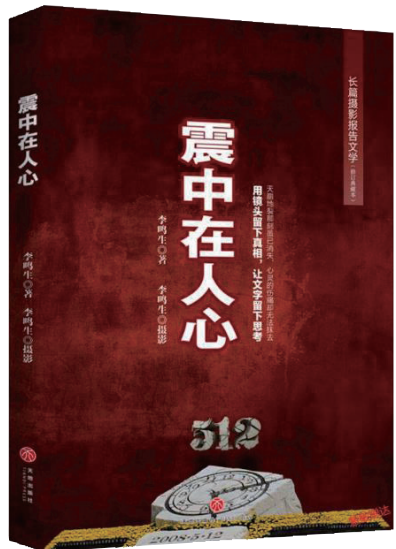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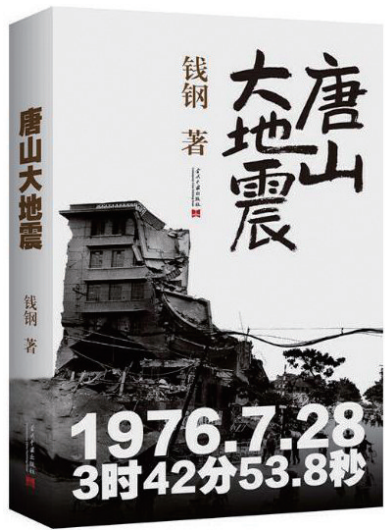
但铭记灾难,并非留住痛苦,留住怨恨,而只为痛定思痛,汲取教训。警告未来,让幸存者时刻保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居安思危意识;让灾难的历史融入每个幸存者的血液中,融进一个国家的记忆里,变成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而提升一个民族的抗压能力,成为日后的强大精神支撑。

当然,铭记灾难如同灾难本身,同样会很痛苦,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痛苦。但任何一次巨大灾难的结束,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在毁灭旧文明的同时,也锻造了新的文明,不仅赐予人类诸多警醒和启示,还常常以其悲剧的形式给予人类继续存活下去的勇气与智慧。所以说,灾难也是人类的珍贵遗产。尽管灾难危害极大,但只要我们时刻铭记,准确握住它的“刀把”,便可化险为夷,将灾害变成利益,用灾难换回价值。

比如,黑死病后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体系,建立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诞生了防疫医学的概念;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改变了有关船舶安全措施的规定,修改了船舶的设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促进了反应堆监测的一大改进,极大增强了人类的环保意识;“911”事件后世界各国联合制定了反恐法律,为人类的平安增设了一道屏障。如此这般,灾难既可改变历史,也能推动社会进步。灾难的历史一旦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还会以种种方式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告知后人:只要铭记灾难,痛定思痛,就能超越灾难残留的苦难,突破人类认知的盲点,浴火重生,继续向前。

问题是,如何才能铭记灾难?有关灾难的历史,中国其实早有记载,且车载斗量。如《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陕西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问题是,我们有记录,但却罕有记忆。究竟靠什么样的记录才能留住记忆、铭记灾难呢?歌

颂救灾的文学固然需要,但窃以为我们更需要的是“见证文学”,即叙述的主体不是救灾人而是受灾人,灾难的主角是受灾人而不是救灾人。因为受灾人与灾难的关系,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是最直接、最具体的,也是最人性化、最精神化的,具有不可替代的



见意义。因而“见证文学”所见证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是生命在废墟下最真实的挣扎,是个个体脆弱而复杂的人性。

45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翻阅当时的历史记录很容易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对地震的认知上,重点是“救灾”而不是“灾难”;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几乎都是“狠批阶级斗争煽动论,促进抗震救灾”;其他文字记录的也都是战天斗地的“豪迈壮举”和“模范事迹”。而对人员伤亡、物资损失、地震原因等绝少论及,这样的记录自然很容易偏离灾难的本

质,其结果很可能是痛定思痛失去前提,民间记忆减少分量,铭记灾难难以得到保障。

但汶川大地震则不同。由于历史的进步,地震发生以后,从上到下,敢于面对,敢于正视,认知的重点从“救灾”变为“灾难”,各大媒体改变了“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老观念,通过全方位的开放性报道,让全世界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真实的灾情,于是救援大军呼啸而来,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对抗震救灾和安抚灾民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此次记录大多都忠实于灾难的真相和本质,前车之鉴便有了根据,避免覆辙便有了前提,铭记灾难也就有了可能。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家沙希利·浦洛基所著的《一部悲剧史:切尔诺贝利》一书,堪称范例。该书直逼历史深处,即将核事故中所有响亮和微弱的声音全部记录在册,又将灾难背后的真相全部披露于世,还将所有模糊和片面的认识一一厘清,为后世铭记灾难留下了“铁证”。而我创作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长篇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不少看过的十多年后还能记住书中的细节,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写得真。可见就灾难文学而言,真实记录才是其力量和魅力所在,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才是后世铭记灾难的保障所在。

其实在如何铭记灾难方面,国外是有不少举措和经验的。比如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为将教训传诸后世,以防灾难在忘记时再次袭来,日本兵库县当年10月便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收集了16万件第一手资料,随后又建了地震纪念馆;同时调查人员还用10年时间对受灾人进行跟踪调研,而后将调查记录公开出版,并在全中国230个地方建了殉难者纪念碑,定期举行祭拜活动,以促使全社会不断唤起对灾害的记忆。比如德国,二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对于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全都明确表示: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甚至扑通一声,竟当众双膝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惊世一跪,犹如一道横空扯响的闪电,瞬间便将世人沉睡的记忆再次唤醒。

灾难并非因为我们害怕才发生,而是因为我们遗忘才降临。健康与平安、快乐与幸福,只存于铭记灾难之时;一旦遗忘,必将再度陷入更大的灾难,甚至成为一生的牢狱。真正的灾难,其实并非灾难本身,而遗忘灾难,才是真正的灾难,也是最痛的灾难。因此,目睹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下的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灾难,我们该如何正视、如何记录,又该如何铭记?

疫情及其文学表达

□李俊杰

疫情由于其突发性、灾难性和悲剧性,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在应对中,人类社会不同机制,不仅应刺激催生出差异化的应对举措,疫情及疫情以后的政治、社会、哲学、伦理等方面差异性追求,也日益凸显。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命运之无常与灾难之无情,在文化层面因不同的审美情趣追求和现实功能需要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并且,意识到这场疫情引发的“灾难”深刻地改变了观念世界和影响着日常生活,已成为共识。

西方社会尤其是英语世界在疫情以来,将“灾难”设置为文学表达的叙述动因,结合疫情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如选举、脱欧、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有了相当丰富的文学创作。同时,以虚构的形式,以假设极端灾变为前提,如气象灾害、末世灾难、病毒灾难、人类文明重建等,模拟人类的选择,以模糊“虚构”和“现实”的界限,达到对疫情时代的某种现实的反思。在中国,多领域、多学科的深度介入,让“疫情”与“后疫情”成为显著的语境和思考的基点。疫情突如其来,影响巨大,不仅向医疗卫生、社会危机、教育方式、新闻传播、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急切需

要应对之策的领域追答案,文学亦是如此。多场或大或小或线上或线下的学术讨论,将文学与现实、科幻与灾难、疫情与抗疫、灾难与灾后等文学思考,推进文学实践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对象乃至路径。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带有“预见性”的两部小说《彼国动物》和《花冠病毒》。

澳大利亚女作家劳拉·吉·麦克凯的处女作《彼国动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她借阿特伍德的同名诗集中的诗句“从另一国度传来的一个声音”(《一个声音》),神奇地预见到了动物流感病毒流行引发的社会崩溃以及想象出在此之后社会的崩溃,人类因感染,拥有了理解动物语言的能力,从而从动物视角对人类行为进行反思。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当代作家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在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再版。毕淑敏的作品是一部因2003年“非典”暴发而沉潜8年,于2012年出版的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其再版恰好是2020年4月。从小说来看,无论是病或者药,抑或是人物关系甚至情节走向,实际亲赴一线体验、参与采访“非典”的毕淑敏,并未就“非典”遭遇的现实进行文本编织,

而是用独特的幻想,将其打造成为了一部集科学与幻想、人道主义、疫情防控、众志成城、英雄主义甚至爱情演绎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本。这两部小说在疫情期间获得读者的关注,与其说是“预见”了疫情,毋宁说是“遇见”了疫情,倘若没有这场影响人类进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延续“生态文学”的《彼国动物》和对“非典”进行再演绎再想象的《花冠病毒》,或许并不会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但两部作品中着力思考的“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在疫情中,引发关注的虚构性作品和引发热议的非虚构文本,高度凸显了个人经验、区域经验与社会文化思潮嬗变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复杂关联。诸多独立的个体事件因疫情的催化形成了蝴蝶效应,在社会中引发了热议。疫情中,经典的以瘟疫为主题的文学经典成为人们重读的选择,同时,这也为现时代的作家塑造了“影响的焦虑”。无论是薄伽丘在疫情中的自我麻醉,还是笛福对疫情惨状的描绘,抑或是加缪近乎冷漠地抉择逃避还是留守,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现实:疫情总会过去,而人类依旧是有限的生命。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需要铭记历史,才能坚定自信,砥砺前行。对于个人而言,从苦痛中收获的精神成果,也可以成为我们对于历史的有力纪念。本期特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作家张翎、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青年学院青年教师李俊杰,结合各自的人生经验、创作体验和研究心得,谈谈沉重的历史与文学创作和人们生活的复杂关系,探讨时代语境中铭记历史的重要意义。



记住的才可能存活

□张翎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为什么会关注灾难创伤题材?我对自己的创作状态是木知木觉的,经过提醒回头一看,才发觉这些年我的确写了一些涉及这类题材的作品,如关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余震》(后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关于江南抗战题材的《劳燕》以及描述贫穷遗孀的心理创伤的《流年物语》等。

其实,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类题材。我刚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通讯交通都还相对落后,回一趟家很不容易。那时的作品里反映的大多是郁郁于心的游子之疼。渐渐地,我的题材和叙述语气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想这是与我多年所处的职业氛围相关的,毕竟一个作家的成长(或退步),总是与个人阅历密不可分。

我成为作家的路走得有点迂回漫长,维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路障。为了能够维持写作,我花了多年时间求学谋职,并做了17年的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我与这份职业的关系和老式的包办婚姻不无相似之处,最初只是为了生活,并无感情可言。在后来的耳鬓厮磨中渐渐擦出了一些暖意,再到后来,才有了一些更清醒的顿悟。当我还在为一天中被割舍的8小时心生幽怨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职业正在慢慢地改变着我观察世界的眼睛。

在我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难民。第一位让我对心理创伤这个话题有所感悟的病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美国一家荣军医院做实习生。这位病人叫沃伦。隔着玻璃看他坐在测听室里的神情,没有任何一个迹象点亮我身上的预警灯。他是一位60多岁的白人男子,高大壮实、面色红润,和秘书说话时,表情和声音都客气温存。可是当我进入测听室并关上门的时候,他突然开始尖叫——那是一种受惊的动物发出的声音,锐利得几乎刺穿我的耳膜。毫无临床经验的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实习导师示意我先出去,才最终将他安抚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朝鲜战场退役,曾在战俘营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回国后他从未讲过他的经历,只是见到穿白大褂的亚裔面孔,常常会失去控制。那时离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查理是我刚刚成为正式听力康复师时遇到的一个病人,是当时寥寥无几的一战幸存老兵之一。他全身行动不便,只有右手的几个手指可以挪动。他用那几个手指熟练地指挥着他的电动轮椅,以九旬之身,演绎着19岁少年人的飙车技艺,在建筑物的缝隙间横冲直撞,行走如风。第一次进入我们诊所,就在墙壁上撞出一个坑,笑声震得大楼晃动,天花板喇喇掉渣。他和咖啡店的女老板调情,夸每一个路遇的女人长得俊俏(bloody beautiful),管助听器叫“劳什子”(the thing)。每一次和我告别,都会上演郑重的道别仪式,拥抱亲吻,说上一句“此生别过”,直到我大喊:“下个月就见的,烦不烦哪。”在他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战争可以夺去的和无法撼动的东西。

阿伊莎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阿富汗难民,她不是我的病人,而是隔壁牙医诊所的清牙师。我们两个诊所有一些共同的病人,所以我和她也算得上熟稔。她常年化着精致的妆容,剪得很短、层次丰富的黑色短发上,挑染着一缕一缕的金黄,笑容可以融化一座雪山。最近阿富汗重新成为热点新闻,我却很难把那些铺天盖地的惊恐画面与我心中的阿伊莎重叠,尽管我知道她也曾是那个背景里的一员。她几乎从不谈及那段流离失所的经历,唯一一次破例,是在她结婚10周年纪念时。她和她的表兄是在逃途中结的婚(在阿富汗表亲可以结婚),她最终的遗憾是无法给她日渐懂事的孩子们看一张她的结婚照。我找到了一家照相店,用我自己寒酸的婚纱照和阿伊莎夫妇年轻时的照片,合成了一张还算“现实主义”的作品,她看到那张“结婚照”时盈盈欲泪的眼神,使我感觉天上一下子出了9个太阳。

维克多来自前苏联。我的病人中来自那里的人不多,所以我对他多少有些好奇。他在病员登记表的职业一栏上填写的是“清洁工”,他的装束举止却和他所填写的职业唱着喧嚣的反

调。他的头发干干净净,留着梳齿的痕迹,白色衬衫的领口和袖口没有一丝油垢。和许多英语不是母语的人一样,他说话声音迟缓低沉,并不直视和他对话的人,但言语中夹带着许多诸如“感谢”“请你”“假如……可以”之类的客气用词,从语法和发音的破绽里钻出来的,是一股无法抑制的书卷气。有一次,我们偶然聊起在居高不下的房市中如何选房的话题,我提到了多伦多东部一个叫匹克岭的地方,那里房价相对便宜。他面色猝变,厉声质问为

要去那个地方?他的失态让我感觉诧异。过后的妻子私下告诉我,维克多曾是一名物理学家,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匹克岭就有一座规模很大的核能发电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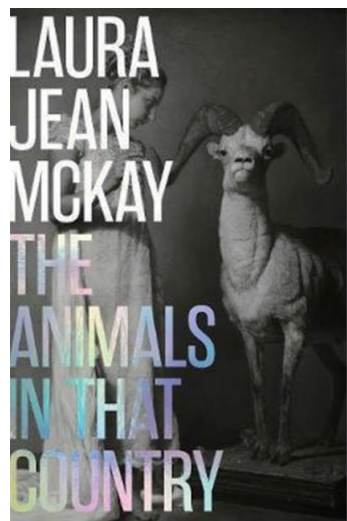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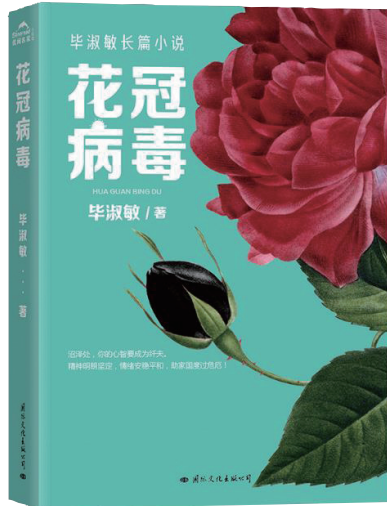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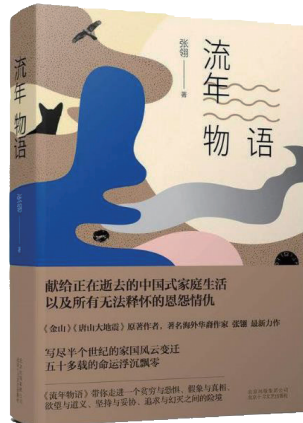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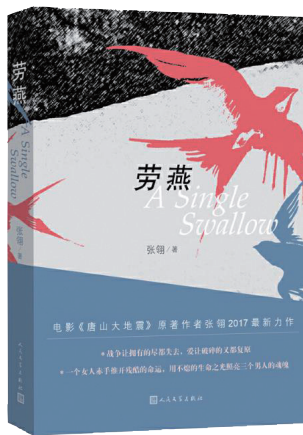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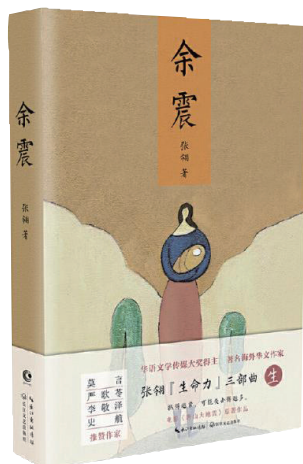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在诊所见识的人群。我并没有亲身经历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但我看见了灾难“溢出物”粘在他们身上的印记。灾难不受国界限制,它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有那么小小的一片,正好流入了我的视野中。

我离开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已经10年了。当年为谋生所做的种种挣扎,尘埃已经落定,而那段经历给我写作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如今却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诊所给了我另一双眼睛,让我看到了灾难溢出物的多种演变可能。它可以在地底下长久地潜伏,等待某个突破口,以便再次冒上地面,化为沃伦见到我时的尖叫声。它也可以在日复一日的潜埋中最终化为土壤中的养分,滋润出查理惊天动地的笑声和阿伊莎头发上的那缕金黄。它也可以一直低敛地浮在浅层,成为维克多挥斥不去的惊恐闪烁眼神。了解了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对创伤遗留的多种表象,就有了更为柔软的理解和宽容。

灾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人们倒下去的样子并没有区别,可是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灾难无可庆贺,值得庆贺和赞叹的是人类强盛的生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在废墟上即刻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奇迹。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缓缓地经历并走出死荫幽谷的人,还有那些带着身上不能拔出的刺,却以与疼痛共存信念生活下去的人,也许更具非凡的勇气。

只有记住的东西才能存活下去,写作的部分意义在于记录生活,包括生活中的灾难,还有灾后人们站立起来的勇气。我把我的观察和情绪,不知不觉移植到了我的母语文化土壤里,于是就有了《余震》《劳燕》《流年物语》这些作品。(文中所用名字皆为化名)

——编者



《彼国动物》英文封面

了解各种灾祸的中国作家展现出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在悲悯昂扬的基调中,诸多电视节目和纪实文学一时间成为了热点。情绪的宣泄和引导,人们的惊慌失措与英雄的大无畏,个人思考的阐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一时间注入“灾难”之中,成为了独特的景观。值得关注的是,疫情期间的诗歌创作,空阔荒诞的“抗疫”诗歌少了,有真情有深度的写作更引发读者的青睐。同时,丰富的民间书写以各种形态展现着疫情中的生活状态,或苦中作乐、或情绪抒发、或观点表达,我们都应将其视作灾难中的自我心灵调适,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

各种极端情境为文学探索人性深度提供了独

特的实验室。各种或大或小的灾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学探索提供了空间。文学可以借这一契机重返构筑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可能。如何快速有效纾解灾难带来的创伤体验,满足个体与集体的需要,此外,又如何在相对稳定的过程中突破文学与灾难相互被“需要”,将探索深化,面对更加本质的人性、命运、人与自然的永恒性命题,仍是任重道远的追求。相较而言,后者似乎应该被提上议程了。